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Ethnography and Cartography in Early Modern China.* By LAURA HOSTETLER.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xx, 257 pp.**

何蘿娜(Laura Hostetler)的著作主要探索 17 到 19 世紀苗蠻圖(或百苗圖)以及其他文獻在清朝所推行的「殖民方略」中的作用。為了研究這個問題,作者下了很大功夫,在中國和歐美各地圖書館搜集了很多難得一見的地圖和苗蠻圖。

該書分為兩部分。在第一部分中,作者把清代的地圖學和民族學放在世界史的範疇內進行比較。第一章描述清朝在早期近代的情況。作者認為,與其他同時代的列強一樣,學者們應該視「大清」帝國為殖民帝國,其殖民方略包括領土擴張、漢族人口的移民,以及對西南部土著的政治支配和經濟剝削。為了建設這樣的帝國,統治者須要對殖民地的土著及其土地有更確切的瞭解。因此,作者在第二章和第三章把注意力放在地圖學和民族學兩方面。以地圖學來講,作者強調在 17 世紀以前,中國製造的地圖與歐洲的地圖並無很明顯的差異,彼此都尚未採用科學的製圖法。17 世紀以後,古式的地圖在中國仍很流行,但新式的比較科學化的地圖也為清廷所採用,例如《皇輿全覽圖》。再者,歷史學家的傳統看法是,中國地圖學自 17 世紀就已落後於歐洲的地圖學了,但作者認為,康熙朝與同時代的法國和莫斯科維(Muscovy)的統治者一樣,都聘請外來的地圖專家繪製最精確的地圖,以期在各國競爭擴大土地的情況下能夠固定本國的邊界。康熙依賴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繪製地圖,與義大利地圖學家為法國國王繪製地圖的做法實同出一轍。採用最新的外來地圖學技術使清廷能夠準確地標示其邊界。

與地圖學一樣,清廷也使用民族學這一工具推行其殖民方略。當然,中國人在秦漢前就有人描寫非漢族的情況,但作者所謂的「民族學」是指根據直接觀察方法而不依靠前人文獻對少數民族的理解和描述。何氏認為,這種經直接觀察而進行的描述在 17、18 世紀頗受歡迎,並且與地圖學一起成為清朝推行其殖民方略的兩個重要工具。

此書的第二部分專門探索了 17 和 18 世紀貴州的民族學。首先,第四章描述貴州省被併入「大清」帝國的過程。貴州雖然早在 1413 年被明朝併入中國,中央政府其實並未完全鞏固對貴州各地及其少數民族的統治。直到 18 世紀中國方比較全面地把貴州放在中央政府和漢族的控制之下。另外,清朝各個皇帝的政策也有所不同。在雍正時期,清廷施行所謂的改土歸流計劃,目的在於把西南

少數民族完全漢化。作者指出，因為改土歸流政策引起少數民族的反抗，乾隆朝因此就採用了不同的方法，即一面宣傳儒家思想，一面褒揚大清國內各種各樣的少數民族的文化。所以，在乾隆時期，官方提倡對各地少數民族加深瞭解；而關於貴州少數民族的地方誌和苗蠻圖是當時搜集資料和豐富知識的標誌。

作者在第五章介紹了 1560 年到 1834 年間出版的數種帶有民族學性質的貴州文獻，包括《炎儂紀聞》（1560 年）、《黔記》（1608 年）、《貴州通志》（1673 年、1692 年、1741 年）和《黔記》（1834 年）。作者認為，這幾種著作反映了有關貴州的描述前後明顯的變化。首先，文獻中所包括的土地範圍越來越大。為證明這一點，作者引用了田汝成《炎儂紀聞》裏一句很深刻的話：「焉知八百車里緬甸諸夷不有列郡縣官吏之日乎？」（頁 132）——田汝成在褒揚清廷在雲貴的武功後，更進一步表達了擴大中國領土的願望。再者，這幾部文獻對少數民族的描述越來越豐富且系統化；例如，《炎儂紀文》只包括了十六個少數民族，《黔記》則羅列了八十二個。此外，儘管作者承認沒有具體根據，但還是認為，較後的文獻更傾向於使用直接觀察的方法。綜合上述幾種趨勢，何氏認為這些描述貴州少數民族的文獻越來越具有民族學的性質。

作者在第六章專門介紹苗蠻圖，並把這種文獻當作民族學一種獨特的史料。苗蠻圖出現於 1692 至 1741 年之間，原是提供給派到貴州省的清朝官僚的行政手冊，故作者大多是官僚，而編輯的目的是讓讀者辨別在官方統治下的各種民族。本書的第七章討論苗蠻圖這種文獻在 19、20 世紀中外藝術界和學術界的影響。

何蘿娜的巨大貢獻在於，本書是歐美學界第一次很系統地介紹苗蠻圖的專著；書中不少文獻和圖畫給讀者提供了難得的欣賞和分析這種資料的機會。作者的目的並不在於利用苗蠻圖瞭解少數民族的生活習慣；而是探索清朝對於少數民族的理解以及苗蠻圖在清朝殖民方略中的作用。這樣一來，何蘿娜這部著作代表近幾年來在歐美學界把清帝國作為積極參與早期近代世界史發展的重要國家之一的學者的看法。他們認為，為了更進一步理解康雍乾三朝的清代歷史，我們不應該從 19、20 世紀所謂「落後」的中國這個角度開始。從早期近代世界史的角度看，「大清」皇帝跟當時其他正在擴張國土的統治者一樣，都能夠意識到民族學和地圖學在國家 / 帝國建構事業（state building）中的密切關係和巨大作用。

作者提到 19 世紀中葉以後，18 世紀貴州文獻所代表的經直接觀察而獲得的知識的做法，不再受清廷官僚所重視。為了解釋這一現象，作者提到了大家熟

悉的道光咸豐時期內憂外患的情況，認為清廷當時缺乏力量繼續重視民族學。這種看法當然有其道理，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更深刻地研究內在的原因，比如說，其中一個原因可能是漢族在貴州的殖民方略在 19 世紀已經基本上鞏固；另一個原因也許是清廷鼓勵學者把民族學研究和注意力轉向別的民族——西方人。

讀完這本書以後，我認為，我們未來還有許多有關的問題值得進一步探討。此書以政府代表的立場和行事為主；如果我們從漢人移居者的角度看問題，會不會發現其他與清廷官僚不同的動機和傾向呢？另外，我覺得很值得研究的一個問題是：研究歐美殖民方略的學者經常強調歐美殖民者把本地人「異國情調化」，在介紹她所搜集到的苗蠻圖時，作者對此有所觸及，但仍有待繼續探索。譬如，苗蠻圖中男女混雜或赤足婦女的場面，對當時接觸苗蠻圖的[男]漢人來說，會否有「色情畫」之嫌？

*Qing Colonial Enterprise* 對於對中國清代帝國建構事業，西南少數民族與漢族之間的關係，和清代文獻感興趣的學者，均屬必讀，值得細嚼。

麥哲維 (Steven B. Miles)

(美) 南伊利諾大學

***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 By LISA ROFE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xvi, 330 pp.**

麗莎·拉弗 (Lisa Roefl) 是美國人類學家，1999 年她出版了《其他現代性——後社會主義中國的性別嚮往》(*Other Modernities: Gendered Yearnings in China After Socialism*)，這是基於她在杭州的一家紡織工廠中的長期田野研究寫成的。在拉弗的視野中，歷史並不是過去之事，它存在於現時之中，一方面是過去的秩序在空間 (space) 上延續，另一方面是在主體性 (subjectivity) 的延續。

拉弗按照「政治代別」(political generation)，大致以年齡為界劃分了三代女工：解放前後參加工作的女工、文化大革命時期參加工作的女工以及 1978 年以後參加工作的女工。她注意到，不同時代的女工在身份認同上有很大的差別。在姿勢 (gesture)、語言 (word)、修辭策略 (rhetorical strategy) 和敘事上，三個群體內部成員很相似，而群體之間則有很大的不同，甚至互相排斥。比方說，解放一代女工經常談論自己英雄的勞動功績，貶斥文革一代的「懶惰」；而文革女工經常不服從權威，跟領導大發雷霆，當然她們也會在上級那裏爭寵，告狀說老一輩的工人如何如何不好。而與此截然不同是文革之後參加工